

中晚明士大夫教化宦官「運動」：以內書堂為中心*

吳兆豐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引言

唐人杜甫(712–770)詩中所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中國近世儒家經世情懷的絕佳寫照。¹用新儒家的話來說，「致君堯舜上」就是「格君」或「得君行道」，即影響和勸導皇帝，進而令政策得到制訂和有效施行。²「再使風俗淳」實即「化民成俗」或「移風易俗」，乃是使基層社會保持淳樸風俗和井然秩序的理念、組織與措施行動。³余英時綜合考察宋明兩代政治文化後指出，皇權獨裁專制和政治高壓使明人經世理想與追求由「得君行道」向「覺民行道」或「化民成俗」轉換。⁴這一觀察具有啟示，

* 本文為武漢大學青年學術團隊建設項目「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凝聚、族群融合與信仰變遷」研究成果之一。三位匿名評審專家對本文提出寶貴修訂意見，敬致謝忱。

¹ 朱鴻林：〈傳記、文書與宋元明思想史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2輯，頁201–28。經世思想研究的最新述評，參解揚：〈近三十年來有關中國近世「經世思想」研究述評〉，《新史學》第19卷第4期(2008年12月)，頁121–51。

² 明代士人「得君行道」的個案研究，參 Hung-lam Chu, “Ch’iu Chün (1421–1495) and the *Ta-hsüeh yen-i pu*: Statecraft Thought in Fif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朱鴻林：〈明儒湛若水撰帝學用書《聖學格物通》的政治背景與內容特色〉，載朱鴻林：《中國近世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20–58。

³ 以鄉約為主的社區建設理念與行動，以普通民眾為對象的管理與教化，都是明代士人「化民成俗」的表現。參朱鴻林：〈明代嘉靖年間的增城沙堤鄉約〉，載《中國近世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頁259–311；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年)；Joanna F. Handlin, *Action in Late Ming Thought: The Reorientation of Lü K’un and Other Scholar-Official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⁴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及其現代變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從明清思想基調的轉換看儒學的現代發展〉，頁218–60；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發微〉，頁10–60；〈從政治生態看朱熹學與王陽明學之間的異同〉，頁346–62。

但不能因此低估乃至忽視明代士人面對政治生態惡化所進行的積極應對、改變與努力。換言之，皇權代表的「政統」固然擠壓士人所宣示的「道統」空間，⁵但「道統」主動向「政統」滲透、使政治不致離「道」太遠的努力，同樣值得重視。

朱元璋(1328–1398)廢除丞相後皇權獨裁專斷已是學界共識，君主罕見臣僚甚至長期不理朝政也是明中期以後的政治實況，而宦官在明代政治制度與權力結構中處於關鍵位置更成為既成政治現實。⁶如此不利的政治形勢，無疑令士大夫直接「格君」的希望變得渺茫，卻倒逼其轉換思路，主張宦官具有常人一樣的「本心」，可以教化為善，將「格君」政治理想曲折地轉化為教化常在君主身邊、最能影響君主的宦官。隆慶六年(1572)末，王畿(1498–1583)因明神宗年幼即位撰成一部旨在通過教化宦官來間接作養君德的《中鑒錄》即是例證。該書以宦官為題材和預設讀者，將宦官分忠、賢、讓、勞、能、準、逆、亂、奸、橫、貪、殘十二類，藉對古今善惡宦官傳記選錄、分類以及極其鮮明的評論，勸誡、教化宦官向善去惡。彭國翔探析《中鑒錄》一書的思想史意義，即對余英時中晚明士大夫「覺民行道」的整體判斷提出修正。⁷筆者對王畿《中鑒錄》一書出現以前，明中期士人如丘濬(1421–1495)、賀欽(1437–1510)、何瑋(1474–1543)、湛若水(1466–1560)、陳建(1497–1567)、唐樞(1497–1574)等人對宦官的新認識、教化宦官的具體思考及原因進行探討。⁸

⁵ 明清兩代君主代表的「政統」侵佔和壓制士大夫集團之「道統」，具有說服力的個案研究，參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修訂版)，〈道統與治統之間：從明嘉靖九年孔廟改制論皇權與祭祀禮儀〉，頁108–37；〈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頁76–105。

⁶ 明代宦官概論，參丁易：《明代特務政治》(北京：群眾出版社，1983年)；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Shih-shan Henry Tsai, *The Eunuchs in the Ming Dynast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洪武時期宦官制度，參黃彰健：〈論皇明祖訓錄所記明初宦官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2本(1961年)，頁77–98；Robert B. Crawford, “Eunuch Power in the Ming Dynasty,” *T’oung Pao*, 2nd ser., 49, livr. 3 (1961), pp. 115–48。仁、宣以後，司禮監代天子「批紅」，乃至與內閣「對柄機要」，掌握國家的中樞權力，參吳緝華：〈明仁宣時內閣制度之變與宦官僭越相權之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1本(1960年)，頁381–403；谷光隆：〈成化時代における司禮監の地位〉，《東洋史研究》第13卷第3號(1954年8月)，頁163–79；歐陽琛：〈明代的司禮監〉，《江西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4期，頁12–21。有關明中期宦官官僚體系發展成熟的論述，參王天有：《明代國家機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180–98；牟復禮、崔瑞德(編)，張書生等(譯)：《劍橋中國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354–60。

⁷ 彭國翔：〈王龍溪的《中鑒錄》及其思想史意義：有關明代儒學思想基調的轉換〉，《漢學研究》第19卷第2期(2001年12月)，頁59–81。

⁸ 參拙文〈「化宦」——明中期士大夫對宦官的新認知與行動〉，《漢學研究》第34卷第2期(2016年6月)，頁37–71。

除撰著專門性「化宦」書籍外，⁹中晚明士大夫重視並利用內書堂教化宦官。內書堂又稱內書館或內館、書館、司禮監書館、司禮監書堂、內府書堂、禁中學館等，是明代設在內廷供宦官讀書的教育機構。¹⁰內書堂定制，由翰林詞臣五六人輪流擔任教習，教授小學和基本儒家經典。在內書堂讀書的宦官人數在二三百人左右，與內閣對柄機要的司禮監秉筆太監，一般是內書堂出身。¹¹內書堂的重要性，如嘉靖中擔任教習的楊淪（嘉靖十一年〔1532〕進士）所說：「內府有書堂，在司禮監，皆近侍太監名下之俊秀者於此讀書學字，名曰文書房出身，猶云進士出身也。異日始得入司禮監執筆，見中外臣工章奏軍國大事，所關繫匪輕哉！」¹²朱鴻林注意到在讀書教育層面，外廷士大夫、宦官以及皇帝接受同一種文化：「宦官與皇帝都有著同樣出身和訓練的老師，他們的所學所習因而相同」，而「學養好的太監，其書本、文字知識無疑足以勝任皇帝的宮中教師，而事實上他們也多是皇帝的啟蒙老師」。¹³換言之，宦官因教育一途學習來自儒家士大夫的道德與文化，又轉而將這種道德與文化影響皇帝。

本文以明人對內書堂態度的變化為切入點，著重呈現中晚明士大夫重視內書堂作為「化宦」平臺的情狀，探討負責教習的翰林儒臣在內書堂施展形式多樣的道德教化實踐，及隨著「化宦」行動的深入展開，內書堂道德教育讀本的編寫、官定與挑戰情形，進而揭示一條中晚明士大夫曲折而實在的「得君行道」路徑之例——透過內書堂「化宦」來間接落實「格君」、影響君主的目標。¹⁴

⁹ 除《中鑒錄》外，萬曆以後宦官傳記類書籍不斷湧現，如張世則《貂璫史鑑》、李騰芳《宦寺考》、徐學聚《歷朝璫鑑》、胡良臣《內臣昭鑑錄》、無名氏《中貴芳華》等。這些書籍內容各具特色，然均有教化宦官之用意，筆者擬另文論析。為行文簡便，本文將「教化宦官」簡化為「化宦」一詞，後文不再贅述。

¹⁰ 對於明代宦官教育機構的設置時間，學界尚有分歧。有認為永樂時已成立，而非始於宣德年間，也有堅持其正式建立於正統年間。見梁紹傑：〈明代宦官教育機構的名稱和初設時間新證〉，《史學集刊》1996年第3期，頁18–23；郝黎：〈再論明代宦官教育機構的名稱和初設時間〉，《北京文博》2006年第2期，頁70–72。但不可否認的是，宦官教育機構的設置，是自洪武以來對宦官進行教育與宦官政治發展的結果。

¹¹ 歐陽琛：〈明內府內書堂考略——兼論明司禮監和內閣共理朝政〉，《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2期，頁56–61；方志遠：《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84–98。

¹² 楊淪：《楊翰林集》，明隆慶四年（1570）楊九經刻遞修本（香港：香港大學藏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北平圖書館善本書膠片），卷六〈內府發蒙〉，頁十九上至十九下。

¹³ 朱鴻林：〈明神宗經筵進講書考〉，載饒宗頤（主編）：《華學》第9、10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367–78。明末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成為清順治帝學習漢文及典籍的老師，是學養好的宦官成為帝師的特別實例。參謝正光：〈新君舊主與遺臣——讀木陳道忞《北遊集》〉，《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頁186–203、208。

¹⁴ 本文初稿見吳兆豐：〈「有教無類」：中晚明士大夫對宦官態度的轉變及其行動的意義〉（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第四章，頁114–72。包詩卿、梁紹傑亦有相關探討，但本文在所用材料、研究旨趣與結論等方面仍有補充或商討之益。參包詩卿：〈明代〔下轉頁68〕

明前期：楊守陳的立場

與中晚明時期相比，明前期士人對內書堂觀感欠佳，對其重要性認識有限。景泰二年(1451)進士楊守陳(1425–1489)的立場可謂典型。天順二年(1458)，楊守陳被命內書堂教習，¹⁵力辭未果。¹⁶成化三年(1467)，其同年好友王獻(1435–?)丁憂守制，「有陰厚之者，請于朝，乞起復〔王〕獻內館教書」。¹⁷楊守陳致信王獻，嚴辭勸說。信中透露楊守陳多年前力辭內書堂教習之故：「向者內館之命，僕初聞駭嘆，以為汗辱，亟欲辭避。徐而思之：文武僕御，罔匪正人；漢世侍郎，亦用儒者。今俾貂璫之徒，蚤服詩書禮樂之誨，意猶近古。……故勉而受命，然心恒不屑，而無間可脫。今始得以滿攷為辭而力脫焉，若蟬蛻于汗濁，若魚泳于清泠，若仙子之謫降塵凡者復歸於清都紫微之天也，執事能復為僕之所不屑者耶？」¹⁸內書堂設置「意猶近古」，但對教事心有不屑，甚至以為污辱，是楊守陳的真實寫意與立場。

楊守陳將政治理想直接寄託於君主，又視宦官為與「格君」對立的因素，是他鄙夷內書堂教習的要因。成化中，楊守陳任經筵講官，「每進講必積誠意，傳經訓，冀納忠以感悟上心」，至以「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召閹樂之禍」為說，令「左右聽者竦然」。¹⁹成化十八年，給太子閱讀的敕纂書《文華大訓》成，該書「篇目、條例多本《大學衍義》，獨事涉中人者，悉不以書」，楊守陳「撮其〔宦官〕賢否得失之故，分註一條，議者不能奪」。²⁰弘治元年(1488)，楊氏上疏孝宗「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任用賢臣，排抑宦官。²¹可見，楊守陳以君主為落實政治理想的直接對象，而宦官是他施展和實現這一理想最需克服的障礙。換言之，排除宦官對君主的負面影響才能「格君」，二者不能並立。

士人對內書堂觀感不佳，乃至有提議廢除翰林教習之制者。弘治元年七月，楊守陳疏言親賢遠佞之時，監察御史曹璘(成化十四年〔1478〕進士)上疏：「近又特設

〔上接頁67〕

宦官教育新析》，《史學月刊》2013年第10期，頁46–54；梁紹傑：〈明代內書堂的設立與祖制〉，載李焯然等(主編)：《趙令揚教授上庠講學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香港：中華書局，2015年)，頁161–88。

¹⁵ 程敏政：《篁墩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五十〈楊文懿公傳〉，頁二上。

¹⁶ 何喬新：《椒邱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十〈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諡文懿楊公墓誌銘〉，頁四二下。

¹⁷ 《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1968年)，卷四六，成化三年九月丙子條，頁957。

¹⁸ 楊守陳：《楊文懿公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明弘治十二年(1499)楊茂仁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十五〈與王惟臣書〉，頁六下至七上。

¹⁹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五十〈楊文懿公傳〉，頁二上至二下。

²⁰ 黃佐：《翰林記》，《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十三〈修書〉，頁165。

²¹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一八四〈楊守陳傳〉，頁4876。

書館，命翰林詞臣教之。詞臣多緣此而顯擢，內官亦假儒術以文姦。乞罷內官之倚任，革內館之教書，一遵成憲，出宸斷，親近儒臣，以求治道。」²² 曹璘建言雖被斥以「言多輕率」，²³ 然從其所言可知時人觀感：內書堂不僅是翰林教習謀取高位的功利場，也是宦官禍政愈深的癥結所在。曹璘敢於發出如此大膽言論，不是有重臣支持，則必有同調者在。曹璘推崇理學名儒陳獻章(1428–1500)自得之學，²⁴ 也是名臣王恕(1416–1508)的支持者。²⁵ 弘治初年，楊守陳、王恕分任吏部右侍郎和吏部尚書，二人「協心為政，相得甚權」。²⁶ 給予曹璘支持的，很可能就是以名節自居的楊守陳和王恕等人。

總之，以楊守陳為典型的明前期朝臣，將政治理想直接寄放在君主身上，又以宦官為阻礙「格君」的因素，甚至視內書堂為宦官權力生長坐大的致因，要求廢除翰林教習之制，故內書堂的重要性自然不會被他們認真檢討和思考。²⁷

中晚明：作為「化宦」平臺的內書堂

對內書堂看法的改變，體現儒臣士大夫由直接「格君」向內書堂「化宦」來間接「格君」的思維調整。這從嘉靖初年貢汝成(1476–1539)和萬曆中周如砥(1550–1615)「不謀而合」之論中可見一斑。

貢汝成出身官宦世族，嘉靖九年(1530)，奉敕與修《祀儀成典》，授翰林待詔，卒於官。²⁸ 所撰《三禮纂註》，成於嘉靖九年他「益盡中秘〔書〕」之後。²⁹ 貢氏對該書

²² 《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1968年)，卷十六，弘治元年七月甲戌條，頁394。

²³ 同上注，頁395。

²⁴ 金恩輝、胡述兆(主編)：《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6年)，「《正德襄陽府志》」條，頁1100。

²⁵ 成化二十三年，曹璘疏言王恕入閣、召用陳獻章。見《明孝宗實錄》，卷八，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己丑條，頁174。

²⁶ 何喬新：《椒邱文集》，卷三十〈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諡文懿楊公墓誌銘〉，頁四四上。

²⁷ 本文選取楊守陳為例展現明前期士人對內書堂的觀感與取態，與中晚明時期相比顯得「消極」，但這並不是說不會有個別反例出現，也不是說明代中後期不會有與楊守陳持相似立場者。此外，明前期儒臣採取「不進取」姿態，並不表示他們任教內書堂都玩忽職守。楊守陳即「嚴教規，正師道」，令「素貴幸者皆肅然承教，罔敢肆」。見何喬新：《椒邱文集》，卷三十〈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諡文懿楊公墓誌銘〉，頁四二下。

²⁸ 梅鼎祚(初編)，施念曾、張汝霖(補輯)：《宛雅初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首都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四年(1749)西陂草堂刻本(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卷八〈貢汝成〉，頁十五上。

²⁹ 貢汝成：《三禮纂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1575)陳俊刻本，卷末，陳俊〈三禮纂註後序〉，頁一上。

頗為自負，稱「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至是而可以自信矣」。³⁰他在書中既提出宦官統於宰相的理想，³¹又酌古斟今以求變通補救之策，力主內書堂「化宦」：

后世奄宦出入省闈，動踰萬人。……有志世道者，莫不欲杜其漸，防其奸，褫其權。然撲於前而炎於后，能制之於開創英明之主，而不能禁止於守成宴安之朝，卒之禍亂相尋而莫之救也，何哉？夫士大夫皆知防奄寺之亂，而不知所以處之；知惡其為人而棄絕之，不知預有以教之也。至于其心術壞，勢焰張，始當所以去之，則斯人之不良，未必皆斯人之過，亦吾士大夫經濟之畧疎、一體之仁不足之過也。彼雖奄人，非必罹宮刑也。名為刑餘，亦吾人也，皆乾父坤母所生，其性亦吾人之性也。性同則善同，獨患無以教之耳。今之計，遴少小奄童十五以上、二十五以下者，聚於〔內書〕館，用文臣端方正直有學術通道藝者教之，導其良心，禁其邪習，發其本明之知，開其忠孝之路，使其心樂為仁人，樂為義士，而不甘心於儉夫佞人之歸。皆有好古之志、慎脩之行，而不願入於妨賢病國之黨，則人君左右前後，罔非正人矣。蓋人君與此輩相親相習之時多，與士大夫相見之時少，其勢則然，莫之變也。苟此輩皆教成而賢者眾，則人君相親相習者多賢人，則古所謂涵養德性，熏陶氣質，鎮躁消邪，日遷善而不知者，固不必燕見士大夫而后受斯益也。且夫君、相苟不棄絕之而有以教之，彼之黨類亦感吾一體之仁，不絕之於綱常名流之外，彼亦必思奮而進於善。宮中府中，相為一體，道德同，風俗一，固不必曲防過抑，以失其心，而內外之治成矣。³²

歷代不乏排斥或攻擊宦官之士，但何以「撲於前而炎於後」？貢氏認為這因士人常以鄙夷和防堵方式對待宦官，而不能擴充萬物一體之心，視宦官為「亦吾人」的同類，教化宦官令其為善。³³既然君主與文臣相接時少而與宦官「相親相習」，則「化宦」不

³⁰ 同上注，卷一〈周禮註題識〉，頁二上。

³¹ 同上注，〈天官冢宰第一〉，「內宰」條，頁十四上至十四下。

³² 同上注，「內豎」條，頁一百下至一百一下。

³³ 貢汝成稱後世宦官「動踰萬人」，反映明代中期宦官數量增長。成化年間，宦官在編人數已達至一萬大關，數量與外廷有品級的文官相若，且很快超過。見牟復禮、崔瑞德：《劍橋中國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頁355。宦官數量不斷增長，既是宦官官僚體系進一步發展的體現，又可見其在帝國行政中的重要力量。這是貢汝成主張「化宦」的可能立足點之一。此外，貢汝成關於「〔萬物〕一體之仁」、「〔宦官〕名為刑餘，亦吾人也，皆乾父坤母所生，其性亦吾人之性也」的論調，出自宋儒程顥〈識仁篇〉及張載〈西銘〉，而「萬物一體之仁」思想正是王陽明及陽明學派最重要而顯著的思想要素之一，相關討論見島田虔次（著）、鄧紅（譯）：《中國思想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一部〈關於中國近世的主觀唯心論——「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頁3–66。貢汝成的理念基調可能受到王陽明思想的影響，然目前並無直接證據支持這一推測。從貢汝成生平來看，
〔下轉頁71〕

僅幫助成就君德，也是消弭宦禍的長遠之策。在貢氏看來，內書堂正是施行道德教育、使宦官變為仁人義士的重要場合。

貢汝成長期在野，在政治上並無特殊建樹，但他的內書堂「化宦」論調竟與積極投身內書堂「化宦」實踐的周如砥契合。周如砥云：「或曰中人讀書識字，我高皇帝蓋有明禁，而宣皇帝至闕內館，以詞臣董之，詞臣亦若樂與之遊者，何居？此有說矣。謂結繩之樸不散于書契則不可，謂中古以來之治非得書契維之亦不可。且夫趙良寒心于景監，袁絲變色于同子，言士節也。若乃人性大同，藩籬安施？善是洗雪，形骸何有？……是以天下無一不可為善之人，故息黥補劓，許由不拒。君側不可有一不善之人，故綴衣虎賁，明王必謹。」³⁴在周氏看來，宦官讀書既是必然之勢，以翰林詞臣實施教化則是必要之事；不與宦官為伍的「士節」固然可貴，但不以宦官為鄙，相信「天下無一不可為善之人」，由內書堂「化宦」進而使「君側」皆善，才能實際補益君德和政治。

實際上，早在正德年間，已見內書堂翰林教習認真教事，且紛紛增添道德教育內容，視內書堂為「化宦」進而間接裨益君德之所。正德初景暘（1476–1524）教內書館，便「嘆曰：『君子無棄人，矧此輩為近君者邪？』每引時事，諭之於正」。³⁵景暘不滿內書堂教育只注重訓釋文義，增添以「時事」為主的道德教化內容，以本朝或當朝宦官史事作為說教。正德四年（1509）教內書堂的何瑋「日以僕臣正道誨之，諸中官咸信服，目為伊川先生」。³⁶所謂「僕臣正道」，與景暘「每引時事」，可謂異曲同工。正德十三年（1518）教習內書堂的陸深（1477–1544）「多所成就」，³⁷其後他自敘教習情形稱：「予往歲以翰林編修官奉命教內書堂，每見生徒中少年敬謹者，必加禮之，且致厚望。以為此皆他日聖天子心膺之寄，與吾輩外庭體貌之臣殊。蓋君父之

〔上接頁70〕

他師事傳薛瑄之學的王鴻儒，與王陽明乃至王門並無交集。羅洪先、聶豹所撰貢汝成墓表、墓志銘或稱「未詳其為人」，或謂「於予無一臂之交」，但貢汝成長子安國師從歐陽德、王畿，並主水西、同善講會。以上參徐儒宗（編校整理）：《羅洪先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卷十九〈明故登仕郎翰林院待詔湖涯貢君墓表〉，頁770–72；吳可為（編校整理）：《聶豹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卷六〈登仕郎翰林院待詔湖涯貢公墓志銘〉，頁193–96；黃宗義（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版），卷二五，頁578–79。

³⁴ 周如砥：《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五年（1642）周燝刻本，卷二，〈刻中學始肄序〉，頁四上至四下。

³⁵ 焦竑：《國朝獻徵錄》，《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徐象榘曼山館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七四，顧璘〈景伯時暘行略〉，頁二三下。

³⁶ 王永寬（點校）：《何瑋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附錄二，馬理〈大明資善大夫南京察院右都御史柏齋何先生神道碑銘〉，頁449。

³⁷ 唐錦：《龍江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三年（1569）唐氏聽雨山房刻本，卷十二〈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儼山陸公行狀〉，頁五上。

心，雖出一致，而遠邇勢分，終不若親且密者之易於納忠也。」³⁸與處於「聖天子心膺之寄」的宦官比起來，外朝士大夫只是「體貌之臣」。這是陸深對君臣關係新形勢的深切體會，也是他重視教事、藉內書堂「化宦」使其將來「納忠」於君的原因所在。簡言之，內書堂成為儒臣間接「格君」的寄託之所。

嘉靖間翰林教習儒臣對教事更見用心。嘉靖六年(1527)至九年教習內書堂的徐階(1503–1583)即是一例：

先是，教書者鄙諸內侍，率晏入早出，或有疑義問，拒不答。……〔徐階〕獨寅而入，盡申乃出，孜孜訓告，無敢厭斲。書或不能誦，使立案前讀；又不能，使跪戶外讀；又不能，使跪庭中讀，期於成誦乃已。自正德來，中貴人驕橫相踵，謂為當然。上即位，稍裁抑之，小大咸怨。公每因講說經史為言：「祖宗之制，諸監局官止四品，不預政事。宣德以後，始被寵澤，衣蟒腰玉，間持政權，至正德而極，非可為訓。且劉瑾、張雄輩驕橫愈甚，得禍愈慘。要之於身有害無利，豈足羨慕？皇上今日之待公等，視正德時則薄，視祖宗時則已優厚。且正所以保全諸公，不宜反以為怨也。」聞者感悅。³⁹

內書堂能否教出好宦官，關係到國家長治久安，「毋易此曹，此曹能償天下事」。故徐階不想「苟簡文具而已」，⁴⁰對內書堂授課極為重視。徐階舉動受陸深影響不無可能，⁴¹同時也有勉勵同道之效。嘉靖六年，王教(1479–1552)教內書堂，「諸內豎望之顛然，無敢弗率者」。⁴²

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李春芳(1511–1584)和胡杰(1520–1571)等也表現出特別熱心。嘉靖二十九至三十五年(1550–1556)，李春芳擔任內書堂教習，⁴³「獨計以為此曹它日且貂璫，而在上左右，不自今令稍知理法，習畏謹，而善逸自便，非所

³⁸ 陸深：《儼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二〈司設監太監董公墓誌銘〉，頁十下。

³⁹ 吳伯與：《國朝內閣名臣事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崇禎五年(1632)魏光緒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卷七〈徐文貞公年譜(上)〉，頁十一上至十一下。

⁴⁰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續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三六〈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貞存齋徐公行狀(上)〉，頁四上。

⁴¹ 陸深曾給徐階母撰墓誌銘，徐階為陸深文集作序亦稱「往年嘗獲侍公，竊窺公之志」。見陸深：《陸文裕公行遠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陸起龍刻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陸瀛齡補修本，卷七〈太恭人顧氏墓誌銘〉，頁二十下至二三上；徐階：《世經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徐氏刻本，卷十三〈陸文裕公集序〉，頁二上。

⁴² 陳永革(編校整理)：《歐陽德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卷二四〈少司馬中川王公墓誌銘〉，頁629。

⁴³ 李春芳：《貽安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1589)李戴刻本，卷十〈附錄〉，王家屏〈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石鹿李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狀〉，頁二一上。

為起教遠萌、童牛之牯之義也。於是度所能行，為立約設程，日課督之，不為假。一時受書中貴人，率嚴憚李先生」。⁴⁴受過嚴格教育的宦官將來「在上左右」必能裨益君德，所以要認真對待。胡杰與李春芳一同被命教習，⁴⁵同樣重視教事：「〔胡杰〕慨然歎曰：『嗟乎！右貂非制也。漢置中常侍猶選用士人，今獨可師其意，令嚮為善，他日不損帝德。』諸常侍無不憚先生者乎。」⁴⁶胡杰相信內書堂培養「為善」的宦官，必將有益聖躬，「不損帝德」。質言之，正德、嘉靖以後翰林教習儒臣重視內書堂教事，是基於其有裨聖德的考慮。

內書堂不僅受到翰林教習人員重視，且成為中晚明朝野共同關注所在。萬曆初，首輔張居正(1525–1582)在經筵上稱，宦官「讀書最好，人能通古今，知義理，自然不越于規矩」，但強調「此中須有激勸之方」，要求提督內書堂司禮監太監「訪其肯讀書學者，遇有差遺，或各衙門有管事缺，即拔用之，則人知奮勵，他日人才亦如此出矣」。⁴⁷這是想從內廷人事除授入手，「激勸」內書堂宦官好學讀書。

明末顏茂猷(?–1637)也強調「教養內監」之重要。顏茂猷，崇禎七年(1634)特撥進士，授禮部主事，然「未任事，即告歸，終於家」。⁴⁸所撰《迪吉錄》一書，「善惡具載，勸戒畢彰」，⁴⁹分官鑑、公鑑、女鑑。「官鑑」下設「內官」門，分列「內官忠善之報」八條、「內官橫溢之報」十五條史事。各條大多附有作者評論和眉批，藉由古今善惡宦官史例，用示勸戒。「內官忠善之報」開篇小序稱：「天有宦侍之星，親近御座，不可廢也。……與人主最習，效忠尤易。周公所以輔導太子者，前後左右罔非正人，則內侍其喫緊也。若能因事納規，匡救扶持，必有外廷所不能得而內臣獨得之者。是一功可勝外臣百功，其於福國庇民，必萬萬矣。……大畧輔養聖德功居第一，保佑正人次之，贊成善事及喫力救失又次之。即今教養內監，最是重任，亦當以此義告之者也。能成就一箇好司禮監，其利澤不少矣。」⁵⁰既然「效忠尤易」的好宦

⁴⁴ 李廷機：《李文節集》(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明崇禎間刊本，1970年)，卷十九〈明故柱國光祿大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石鹿李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行狀〉，頁1648–49。

⁴⁵ 申時行：《賜閒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卷二八〈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劍西胡先生墓志銘〉，頁九上。

⁴⁶ 陳與郊：《隅園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至天啟元年(1621)賜緋堂刻本，卷十四〈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國子祭酒劍西胡先生墓表〉，頁六上。

⁴⁷ 《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1968年)，卷三十，萬曆二年十月癸亥條，頁732。

⁴⁸ 鄭達：《野史無文》(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三〈烈皇帝遺事上〉，頁10。

⁴⁹ 顏茂猷：《迪吉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卷首，顧錫疇〈迪吉錄序〉，頁三下。《迪吉錄》的最新研究，參吳震：《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頁105–76。

⁵⁰ 顏茂猷：《迪吉錄》，卷二，「內官忠善之報」，頁六一上至六一下。

官「利澤不少」，故「教養內監，最是重任」。在顏氏看來，一方面，要嚴格選任內書堂教習人員；⁵¹另一方面，須以「輔養聖德」、「保佑正人」和「贊成善事及喫力救失」等宦官善行善事，反復感化內書堂宦官。⁵²

明末宦官也視內書堂「化宦」為解決內廷病弊的關鍵。劉若愚(1584-?)《酌中志》對遭魏忠賢(1568-1627)專權破壞殆盡的內廷典制提出補救建議。劉氏載司禮監之制稱：「如欲內廷有真正忠良才品，必先將內書堂振刷，優選聰明穩重慈善之人，加意訓教，以儲十餘年或二三十年之後大用可也。」⁵³他述文書房又說：「如欲君德昭明，左右得人，須先振刷內書堂起。」⁵⁴劉氏述內書堂再一次重申：「如欲痛改前轍，只在聖主右文主持于上，好印公提督掌司振飭于下，不吝教、不憚煩詞林老師激勸于外，不倚勢、有良心學長、曉事年長應之于中，不三五年，即有成效；十年內外，國家自享真才之用。消元黃之戰于廟堂，衍無疆福澤于億世。」⁵⁵補救內廷之政，先從內書堂教化出好的宦官入手，這是劉若愚「三致意焉」的要點。⁵⁶

清初士人省思前朝舊事，仍肯定內書堂「化宦」之益。陳玉璣(康熙六年[1667]進士)稱太監馬氏不與魏忠賢合作，決意退守，與其早年受到內書堂良好教化關係密切：「張元忬為修撰，教習內書堂，時取《中鑒錄》自為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以為補救。以公為人觀之，即生其時，亦何藉有此。羅圭峯為內官白江、傅容、御馬監字羅撰誌銘，人竊非之，……則或者之非圭峯，未為無見。而予之援引明祖訓及元忬所云，亦不宜偏廢也哉！」⁵⁷關於張元忬(1538-1588)的內書堂「化宦」行動，後文將專門論析。從引文可見，羅玘(1447-1519)為內書堂弟子撰作誌銘，這

⁵¹ 同上注，小序上眉批，謂「教內監便當擇人了」，頁六一下。

⁵² 「輔養聖德」、「保佑正人」和「贊成善事及喫力救失」，實指涉明太監覃吉和懷恩兩人事跡。覃吉以輔導孝宗聞名，懷恩以保護林俊、王恕等名臣見稱。顏氏稱覃吉「格心大人」，並謂：「賴一賢監，便成聖治，蓋當其儲養時，格心最易也。」謂懷恩：「外臣匡救甚難，又有譴怒刑戮之患，又不得朝夕敷陳，故事倍而功半；內臣熟天子情性，得候時便，又素親密，雖怒不獲重譴，可以宛轉深言，故事半而功倍。若得好司禮監重重相繼，與良宰執同輔明時，而儲君左右又是好人輔導之，何憂不萬世太平哉？」見顏茂猷：《迪吉錄》，卷二，「內官忠善之報」，頁六七上(眉批)、六七下、六九上至六九下。

⁵³ 劉若愚：《酌中志》，《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鈔明季野史彙編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內府衙門職掌第十六〉，頁五(原書無頁碼)。

⁵⁴ 劉若愚：《酌中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潘氏刻海山仙館叢書本，卷十六〈內府衙門職掌〉，頁四下。

⁵⁵ 同上注，頁八上。

⁵⁶ 劉若愚念茲在茲，在書中別處又稱：「祖宗設內書堂，原欲於此陶鑄真才，冀得實用。」見劉若愚：《酌中志》(《續修四庫全書》本)，卷十八〈內板經書紀畧〉，頁二上。

⁵⁷ 陳玉璣：《學文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影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刻本(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序十一〈內監馬公詩序〉，頁十四上至十四下。

一行為遭受非議。明末諸生張自烈作〈書羅圭峰集後〉非之，⁵⁸即是一例。但在陳玉璠看來，遵守祖制、士人嚴守節氣及利用內書堂「化宦」，均具價值，同樣重要，「不宜偏廢」。

綜上所述，明代中後期士大夫不僅認為宦官「其性亦吾人之性也」，而且正視宦官位置與職責，稱其居「聖天子心膂之寄，與吾輩外庭體貌之臣殊」，認可宦官對朝政正面作用，謂其「匡救扶持，必有外廷所不能得而內臣獨得之者」。對宦官的重新思考與認識，是他們改變對內書堂看法，進而主張透過內書堂「化宦」的應有之義。對於中晚明士人來說，內書堂「化宦」，既是間接落實「格君」理想的可行方案，又是宦官政治既成事實之下的補救之方。內書堂「化宦」不僅成為中晚明朝野的共同關注，且變為翰林教習儒臣多彩紛呈的道德教育實踐。

多彩與同趨：內書堂「化宦」實踐

重視內書堂教事，增添以宦官史事與史例為主的道德教育內容，期使宦官知所趨正，向善去惡，漸成中晚明翰林教習儒臣之同趨。然在道德教育的具體內容與方式上，卻呈現形式多樣、推陳出新的特色。

善惡並呈

兼舉歷史上善惡宦官史事，是翰林教習者施展道德教育的重要內容。亢思謙（1515–1580）同情王學，但反對「師陸誣朱」，主張調和朱陸。⁵⁹亢氏不僅是有思想主見的獨立儒者，還是注重實際勝於追逐名節的務實儒臣。⁶⁰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受命教內書堂，「嘆曰：『此輩不患無材藝，患不知大義耳。』每取漢唐以來宦官事可為勸戒事者，反覆訓諭之，中人感動」。⁶¹強調內書堂教育不在知識文化傳授，而在道德感召，故兼呈宦官善惡史事，勸懲並進，用作訓化。

⁵⁸ 張自烈：《芑山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初刻本，雜著卷二〈書羅圭峰集後〉，頁二五上至二五下。有趣的是，〈書羅圭峰集後〉行間所附評語稱：「張公元忬為脩撰，奉旨教習內書堂，云：『若曹星近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為善。』乃取《中鑿錄》自為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按此亦補救之法。」

⁵⁹ 亢思謙：《慎修堂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萬曆詹思虞刻本，卷四〈重刻陽明先生文粹後序〉，頁三一上至三二上；卷十二〈六經論〉，頁二二下至二四上；卷十五〈朱陸同異辨〉，頁三十下至三二下。

⁶⁰ 同上注，卷八〈賀方伯廬會溪陟左使序〉，頁十八下至二十下；卷十〈賀節推楊會江應召北上序〉，頁二八下至三十下。

⁶¹ 張四維：《條麓堂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張泰徵刻本，卷二六〈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水陽亢公墓誌銘〉，頁三七下。

嘉靖四十一至四十五年(1562–1566)任教內書堂的陶大臨(1526–1574)，也將歷史上宦官「清公奉法以令終者」與「其貪暴負國參夷五宗者」並相陳說，「委曲辨析不已」，以作訓化，「諸孺璫咸拱手曰：『此公異日謂我也。』」⁶²陶氏勸懲並重的教育特色收效甚佳，乃至「至今中貴人稱陶先生師範嚴，所稱說古今，凜凜動聽」。⁶³

黃洪憲(1541–1600)施教與亢思謙、陶大臨相仿。萬曆二年(1574)，黃氏內書堂「化宦」之舉，是他「讀書有經世志，不專以詞藝自喜」的表現，嘗「曰：『是且在天子股掌間，為禍福不細。』」數舉古今宦侍為鑑戒，詞色甚莊」。⁶⁴黃氏施教勸懲兼重，且不局限於前代宦官事蹟，重視本朝實例交互為用，以求感化。

敖文禎(1545–1602)亦是如此。萬曆九年，敖氏與同年馮琦(1558–1603)、余繼登(1544–1600)等一同任教內書堂，⁶⁵「每舉前代呂〔強〕、張〔承業〕為勸，〔曹〕節、〔王〕甫為戒」，⁶⁶「諸群豎，拱聽懼然」。⁶⁷呂強、張承業是東漢、唐末公認的賢良宦官，曹節、王甫則是東漢惡宦代表。可見，敖氏在內書堂施行的也是善惡宦官史事並舉的教育。

「賢可為法」

與善惡宦官史事兼舉以起勸誡之用不同，專門舉說歷代賢善宦官，是以「正面史例」期使宦官「躍然興起於善」，河南安陽人郭朴(1511–1593)即是一例。郭朴，嘉靖十四年(1535)進士，重經世適用，任職翰林期間，「凡歷代及國朝故實，博綜詳究，務求適用，不徒揆藻競長，繇是經濟日裕」。⁶⁸督修工程太監楊氏廉潔自律，得到工部尚書等官員好評。鄒德涵(1538–1581)「因詰〔楊氏〕所自」，楊氏答謂：「非予師安陽郭公，予曷致此？往典教中貴者，路人視也。獨安陽公不予棄，勤勤開迪，數舉呂疆、懷恩輩，示之準則。恨不能效，若為靦顏多矣，忍為汗浼哉！」楊氏行止端良而「推本安陽之教」，可見郭朴教習內書堂效果甚佳。這既是郭氏不以「路人視也」、重視教事的結果，⁶⁹更是他以歷史上賢宦呂強和本朝良宦懷恩事蹟感召教化所致。

⁶² 王世貞：《弇州史料後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萬曆四十二年(1614)刻本，卷四〈陶文僖公傳〉，頁十八上。

⁶³ 王錫爵：《王文肅公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王時敏刻本，卷五〈陶文僖公神道碑〉，頁三上。

⁶⁴ 同上注，〈少詹蔡陽黃公神道碑〉，頁二四下。

⁶⁵ 《明神宗實錄》，卷一一二，萬曆九年五月丙子條，頁2142。

⁶⁶ 敖文禎：《薛荔山房藏稿》，《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牛應元刻本，卷十，郭正域〈墓銘〉，頁七三下。

⁶⁷ 同上注，卷十，張應泰〈傳〉，頁八五下。

⁶⁸ 郭朴：《郭文簡公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康熙十三年(1674)思齊軒刻增修本，卷六〈附錄〉，李標〈明少傅贈太傅謚文簡東野郭公傳〉，頁三下。

⁶⁹ 鄒德涵：《鄒聚所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鄒裘鄒袞刻本，卷六〈書中貴楊純菴冊〉，頁三一下。

同年孫陞(1501–1560)和趙貞吉(1507–1576)二人，實與郭朴共襄教事。孫陞遊學國子監，受陸深賞識，⁷⁰官至南禮部尚書。趙貞吉「以經世大業自喜，好講古黃石《素書》」，⁷¹位至內閣大學士。《酌中志》載三人任教情形云：「〔王翺〕撥司禮監內書房讀書，受業于郭東楚、趙太洲、孫繼泉先生，咸器重之，且曰：『爾諸生係內史，不必學舉業文章，惟講明經、史、《書》、《鑑》及本朝典制，以備聖主顧問，有餘力，學作對與詩可也。』」⁷²「作對與詩」並非授學重點，提高宦官對《書經》、《資治通鑑》及本朝典制掌握能力，方是三人施教目標。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所教也是儒臣希望君主著重掌握的經典典章及經筵、日講重要內容。作為「外史」的翰林文臣，希望透過內書堂，培養、教化「備聖主顧問」的「內史」之臣，再由其輔導君主，成就聖德。儒家的政治知識和道德文化，遂由內書堂間接滲透到皇帝身上。

汪鏜(1512–1588)與郭朴教法相近。嘉靖三十三年(1554)，汪氏教內書堂，「每為譚〈小雅·巷伯〉以下，保其專良之志」。⁷³《詩·小雅·巷伯》，孟子所作。孟子賢者，被饑而宮，故作詩以斥誣陷者。汪鏜以歷史上賢宦勉勵小宦官，「保其專良之志」，與郭朴「數舉呂彊、懷恩輩，示之準則」，異曲同工。

嘉靖三十二年(1553)進士姚弘謨(1531–1589)所行教法與郭朴、汪鏜並無二致。嘉靖三十六至三十八年(1557–1559)，姚氏教習內書堂，「每談說〈小雅·巷伯〉及累代宦豎之賢而奉法者，皆矍然竦聽」。⁷⁴無獨有偶，嘉靖三十五年(1556)進士金達，嘉靖三十九至四十二年(1560–1563)執教內書堂，也「述古寺人之忠且賢者，訓勉之」。⁷⁵可見，以歷代賢宦實例為模範，鼓舞、感召內書堂宦官，是翰林教習者較為普遍採用的施教內容。內書堂讀本《思齊錄》之編刊，更具說明意義。

《思齊錄》今不存，嘉靖、隆慶之際刊於世。⁷⁶該書作者李貴(1522–1571)，江西豐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與姚弘謨同年。李貴始職內書堂稍晚於姚氏，但他在嘉靖三十七至三十八年(1558–1559)、四十二至四十五年(1563–1566)，兩度擔任教習。⁷⁷

⁷⁰ 焦竑：《國朝獻徵錄》，卷三六，李本〈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季泉孫公陞行狀〉，頁五七上。

⁷¹ 趙貞吉：《趙文肅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1585)趙德仲刻本，卷首，高啟愚〈趙文肅公文集序〉，頁一上。

⁷² 劉若愚：《酌中志》(《續修四庫全書》本)，卷二二〈見聞瑣事雜記〉，頁十四上。

⁷³ 沈一貫：《喙鳴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卷十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遠峰汪公行狀〉，頁三一下至三二上。

⁷⁴ 申時行：《賜閒堂集》，卷二五〈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姚公墓誌銘〉，頁二上至二下。

⁷⁵ 喬滄(修)、賀熙齡(纂)、游際盛(增補)：《道光浮梁縣誌》，《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清道光三年(1823)刻十二年(1832)增補刻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十三〈人物·賢良·金達傳〉，頁四三上。

⁷⁶ 李貴：《浣所李公文集》，臺灣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十年(1582)湖廣刊本，卷九，吳椿〈太史李浣所公暨吳孺人行狀〉，頁十下。

⁷⁷ 同上注，卷五〈思齊錄引〉，頁三下至四上；卷九，戴洵〈明故四川按察司副使浣所李先生偕吳孺人合葬墓誌銘〉，頁十五上至十五下。

《思齊錄》正是李貴內書堂「化宦」實踐的結晶。李貴少從遊於鄒守益(1491–1562)，得聞王陽明良知之學。⁷⁸入仕後，參與由徐階等王門組織的講學活動。⁷⁹庶常館讀書及翰林任職間，孜孜講求天下治理，「編集古名臣相業，日自省覽，慨然欲身任天下之重」，「自鍾律、刑賦、兵車陣法，靡不綜覈，著為喆論」。⁸⁰李貴用心內書堂授徒及編刊《思齊錄》，也是他著實以「化宦」改善治理的表現。

李貴在內書堂，「每卯而入，盡申而退，諸生魚貫而進，督以課程，不敢廢也」。他認為教化出「好」宦官，將獲「聖天子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凡所任使，罔不稱職」的收效，有「補聖治」。但內書堂不應「徒鯁鯁然惟課程之末是求」，當「申訓以忠」，以歷代「賢可為法」的宦官事例感化宦官為要。⁸¹這實是《思齊錄》的編寫緣起和主導理念。

《思齊錄》以歷代「賢可為法」的宦官為收錄對象，分忠謹、諫諍、保賢、建功、文學、節儉、恬曩、伎巧八類。從分類情形看，《思齊錄》參考《冊府元龜·內臣部》：《思齊錄》忠謹、諫諍、保賢、建功、文學、伎巧各類，與《冊府元龜》忠直、規諫、薦賢、立功、才識、幹事各門，若合符節。⁸²但節儉、恬曩兩類為《冊府元龜》所無，似屬《思齊錄》新創，可見李貴對宦官摶節寡慾、清廉奉公尤為重視。《思齊錄》不錄明朝賢宦事蹟，作者稱因「國朝賢者頗多，未有信書，恐恣遺誤，姑俟詳考以續之」。

李貴以賢宦史例施教內書堂雖非首例，但他有意撰著《思齊錄》卻頗為重要。一如他在書序中所稱，《思齊錄》專為內書堂而設，「凡所以事主、蒞官、淑身之道備載，使諸生觀之，躍然興起于善，人人思效忠，以齊于前賢」。⁸³《思齊錄》的直接影響目前雖無從獲知，但它的撰刻無疑在客觀上為內書堂提供教育讀本，並為翰林教習者提供參考與施教範式。

李貴的事業確實後繼有人。隆慶二年(1568)進士羅萬化(1536–1594)、黃鳳翔(1539–1614)、趙志臯(1521–1601)三人也打算編寫以賢善宦官事例為內容的內書堂

⁷⁸ 同上注，卷九，吳椿〈太史李浣所公暨吳孺人行狀〉，頁九上。李貴又作鄒守益祭文，見同卷，〈祭東廓老師文〉，頁二上至三上。

⁷⁹ 李貴：《浣所李公文集》，卷九，戴洵〈明故四川按察司副使浣所李先生偕吳孺人合葬墓誌銘〉，頁十五上。

⁸⁰ 同上注，頁十六上。

⁸¹ 同上注，卷五〈思齊錄引〉，頁三下至四上。

⁸² 檢《冊府元龜·內臣部》其下「才識」門乃載內臣具有文學才藝者，故與《思齊錄》一書「文學」類，名異而實同。此外，《思齊錄》「取古奄寺勃鞞之屬，善可為法者若干人」，可見所錄首位宦官為「忠謹」類勃鞞。《冊府元龜·內臣部·忠直門》所錄首位宦官也是勃鞞。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卷六六六〈內臣部·忠直〉，頁7681。

⁸³ 李貴：《浣所李公文集》，卷五〈思齊錄引〉，頁四上。

讀本。羅萬化是王畿弟子，⁸⁴ 熱衷王門講學。⁸⁵ 趙志臯從學於錢德洪(1496–1574)、王畿，與徐用檢(1528–1611)等相盟講學。⁸⁶ 黃鳳翔「學術一稟紫陽，務躬行實踐，不設道學之名」。⁸⁷ 三人學術不同，但關係密切，相得甚深。隆慶二年，三人一同被命教習內書堂。翌年八月，黃氏因病離任，作〈教內書堂記〉追述教習之事。指出內書堂宦官平時「各自有師，其旦暮課業，一如塾師例」，教習者不應以「課書作對」為已足，當令其「熟文義，達理道，它日為國家作好事」為職志。黃氏與羅、趙二人商討編纂「鼓其〔宦官〕向善之心」的歷代宦官「英雄」事例之讀本，用意可謂明顯：

往哲所稱奄宦，自東漢迄後唐，惟數呂彊、張承業兩人，其稱許太陞，俾供事掖庭、豫參帷幄者，視為殊躅，不足鼓其向善之心。即兩漢時如黃門令史游之勤款納忠，多所補益；鉤盾令鄭眾之一心王室，不事豪黨；中常侍良賀之清儉退厚，不敢薦士；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之清忠恬寂，靡爭威權；小黃門甘陵吳伉之博達奉公，從容寺舍。所可稱者奚啻呂彊一人而已！迨于唐季，凶奄之煽禍極矣。然而彊立持正，排擠邪黨，則有如俱文珍；奮身定難，讓功辭賞，則有如馬存亮；痛嫉儕類，退隱青城，則有如嚴遵美；仗義矢節，飲泣平賊，則有如楊復光。皆庶幾疾風勁草，狂瀾砥柱，奚待至後唐乃稱一張承業也。余乃謀諸羅、趙二君，稍攬摭節畧，彙次名籍，命書史編錄成帙，以示諸小奄，命時時習讀，間呼而問之，亦有能津津頌說者。⁸⁸

黃氏苦心孤詣，有意發掘漢唐間眾多宦官善言善行，加以「編錄成帙」，其用意是讓宦官「時時習讀」，潛移默化，化其為善。但從黃氏未題書名可知，該讀本並未成書刊行，只具講義性質，這與黃氏因病離任或有關係。然而，黃鳳翔、趙志臯、羅萬化三人欲編纂內書堂講義之舉，可能影響到王畿。黃氏等三人中，趙志臯、羅萬化均從學於王畿。隆慶六年(1572)四月，趙志臯「冊封吉藩」，後更取道返鄉，⁸⁹ 期間

⁸⁴ 吳震(編校整理)：《王畿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卷七〈龍南山居會語〉，頁166。

⁸⁵ 趙志臯：《趙文懿公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趙世溥刻本，卷二〈賀康洲少宗伯羅年丈五十叙〉，頁十三下至十六下。

⁸⁶ 程子鏊(纂修)、劉芳喆等(續修)：《(萬曆)蘭谿縣志》，《故宮珍本叢刊》影印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刻清康熙十一年(1672)續刻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卷四〈人物類上·鴻業·趙志臯傳〉，頁十二下。

⁸⁷ 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三〈文簡黃儀庭先生鳳翔〉，頁六上。

⁸⁸ 黃鳳翔：《田亭草》，《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1612)刻本，卷七〈教內書堂記〉，頁三上至三下。

⁸⁹ 趙志臯：《趙文懿公文集》，卷末附〈行實〉，楊道賓〈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潞陽趙公行狀〉，頁三下。

可能與王畿會面，談及編纂內書堂讀本事。職是之故，萬曆元年(1573)王畿在給趙志臯信中稱「《中鑒〔錄〕》之輯，自吾弟〔趙志臯〕起因」。⁹⁰

歌詩之教

明人文集中經筵、日講講章比比皆是，但保存在張元忬文集內的內書堂講義〈內館訓言〉，可謂罕見。〈內館訓言〉顯示，張元忬不僅講說賢善宦官史例感召宦官，且教以品行倫，「誘之歌詩」。⁹¹

浙江山陰人張元忬，隆慶五年進士，王畿門下弟子。⁹²他與羅萬化、朱賡(1535–1609)讀書里中，結為至交。⁹³張元忬是一位學而自得的陽明學者，羅萬化稱其「遠宗文成，而體驗實踐自得為多」，以「力行」矯偏救弊。⁹⁴雖從遊於王畿，張氏歆慕唐樞躬行經濟之學，自稱「私淑其教」。⁹⁵讀書庶常館，張氏「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每抵掌論天下事」。⁹⁶任翰林修撰期間，「於人材及邊務，至他生民利病，皆手有記」。⁹⁷無怪乎周汝登(1547–1629)說：「昔聞肅皇帝之謂陽明子也曰：『王守仁是有用道學。』……世用之學，雖稱孝稱弟，猶為士之次；忠節比於東漢諸人，猶謂之無當於道，無救於時，而況其下者乎？此公〔張元忬〕所為重於世，而余深有嘆乎近時之不易得也已！」⁹⁸

隆慶六年十一月，鑑於神宗年幼即位，張元忬疏言當效明成祖故事，纂修《女鑑》並加宣講：「如此則慈母之親，即為師保；綴衣之賤，皆化忠良，所以養成聖德、肅清政本者，其益豈淺鮮哉？」⁹⁹此疏「不報」，因其不為時相張居正置可，¹⁰⁰但

⁹⁰ 《王畿集》，卷十一〈與趙灑陽〉，頁289。

⁹¹ 張元忬：《不二齋文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張汝霖張汝懋刻本，卷六〈內館訓言〉，頁二四上至三三下。〈內館訓言〉既是明代唯一可見的內書堂教化宦官講義，又是中晚明士大夫內書堂「化宦」實踐的「高峰」表現，且與後文討論緊密相關，茲將全篇附錄於後文。

⁹²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五〈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忬〉，頁323–29。

⁹³ 張元忬：《不二齋文選》，卷一，朱賡〈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張公行狀〉，頁二上。張元忬與朱賡另有姻親關係，張氏子張汝霖與朱女結為連理。

⁹⁴ 張元忬：《不二齋文選》，卷一，羅萬化〈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張公墓表〉，頁十九上。

⁹⁵ 同上注，卷四〈贈王學博序〉，頁十四下。

⁹⁶ 同上注，卷一，王錫爵〈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張公墓誌銘〉，頁十一上至十一下。

⁹⁷ 同上注，卷一，孫鑛〈郡志小傳〉，頁一下。

⁹⁸ 同上注，卷首，周汝登〈題陽和張先生文選序〉，頁三上至四上。

⁹⁹ 同上注，卷一〈脩實德求直言以謹天戒疏〉，頁十一下至十二上。

¹⁰⁰ 同上注，孫鑛〈郡志小傳〉，頁一下。

張元忭堅持「閨門實王化之原」，¹⁰¹仍「蒐拾經傳之遺，稍刪定之」，編成《內訓》，以為「正家之一助」。¹⁰²張氏透過加強宮內教化以提升君德的努力，可見一斑。

張元忭重視內書堂「化宦」，既是他一貫關切豫養君德使然，又受其師王畿影響。萬曆元年，王畿向在京王門同志推廣《中鑒錄》之際，張元忭回浙鄉居，¹⁰³至萬曆六年(1578)秋始入教內書堂。¹⁰⁴這期間他與王畿聯繫甚密，講學東南。¹⁰⁵《中鑒錄》論及內書堂，有云：

內學堂之制，……教之寫字讀書，謹其禮節，開其知見，隨其根性高下，乘其機而導之。……使之潛消默化，習與性成，日入於善而不自知。今日年少之中官，即他日所用之近侍也。因與提督中官講究教養之法，使知所以自愛，亦以信吾輩之為可親，而不欲自外於縉紳。其法未嘗不善，蓋內外夾持之意也。後來人情玩弛，漸非初意，學者俱失其初，飲食宴遊，習為玩嬉，彼提督者，絕不相見，蓋文存而實廢也。是豈立法之意哉？吾黨與有過焉，不可不分任其責也。¹⁰⁶

王畿希望翰林教習敢於擔當，因材施教，使宦官「日入於善而不自知」，並主動與提督內書堂大璫商討教養之法，共謀成事。張元忭入教內書堂，王畿更去信謂「內館之設，事幾若微，於聖躬得養與否，所係匪輕」，責問「不知相繼主教者，能悉領此意、不作尋常套數挨過否」，¹⁰⁷頗見殷切。可見，王畿對張元忭的內書堂「化宦」行動應有影響，朱賡甚至徑稱張氏以《中鑒錄》施教內書堂。¹⁰⁸

張元忭施教內容確實別具特色，¹⁰⁹〈內館訓言〉小序稱：

余奉命教習內館。蓋諸豎雖微眇，然必教之於童時，使知趨向，而後用之於他日，庶無愆違，……余以為任無大小，莫非王事，矧茲教習，所關係非

¹⁰¹ 同上注，卷一〈脩實德求直言以謹天戒疏〉，頁十一上。

¹⁰² 同上注，卷四〈內訓序〉，頁一下。

¹⁰³ 《明神宗實錄》，卷一六，萬曆元年八月庚戌條，頁471；張元忭：《不二齋文選》，卷一，朱賡〈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張公行狀〉，頁三下。

¹⁰⁴ 張元忭：《不二齋文選》，卷六〈內館訓言〉，頁二四上。

¹⁰⁵ 彭國翔：《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頁562-66。

¹⁰⁶ 王畿：《中鑒錄》，《故宮珍本叢刊》影印明刻本，卷一〈中鑒答問〉，頁七下至八上。

¹⁰⁷ 《王畿集》，卷十一〈答張陽和〉，頁285-86。

¹⁰⁸ 張元忭：《不二齋文選》，卷一，朱賡〈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張公行狀〉，頁四上；王錫爵〈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張公墓誌銘〉，頁十一下。

¹⁰⁹ 首先，〈內館訓言〉和《中鑒錄》內容有出入，〈內館訓言〉所舉賢宦五人，曹騰、趙默二人未出現於《中鑒錄》中。其次，二者對象不同，〈內館訓言〉以內書堂為對象，以賢良宦官史例感召誘導；《中鑒錄》則善惡宦官史事具載，且不專為內書堂而設。

淺鮮者。故每如期而入，於常課之外，擬為訓言八條，曰忠、廉、誠、慎、慈、儉、謙、和，各系以詩；又摘史傳中賢宦事蹟，各為訓解，日取一條，令年長二人宣讀二遍。諸童豎皆環立而聽，講畢歌詩，皆同聲而和之。維時司禮老成者，聞館中講且歌，並相讚歎，諸豎亦勃勃鼓動。¹¹⁰

張元忬頗為不滿的「常課」，即朱賡所說「乙其章句，課之對語」。¹¹¹而張氏施教包括如下三項相為輔成的「節目」：先取史傳中賢宦事蹟，條訓釋解，勉勵其志；再分別講說「忠、廉、誠、慎、慈、儉、謙、和」八訓，鍛煉其品質；又作八訓之詩，令其歌詠，誘其德性。此舉收效甚佳，以至提督內書堂司禮監太監都稱許有加，小宦官受教之際也歡欣鼓動。

張元忬在內書堂所實踐的道德教育，明顯受其祖師王陽明的影響。王陽明〈訓蒙大意〉反對童蒙教育只以「記誦詞章」強開知見，倡導「教以人倫」，「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即「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¹¹²張元忬受到王陽明的啟發，因此不滿內書堂的「常課」，重視道德感召，教以品行，作詩歌詠，¹¹³且將陽明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變為「忠、廉、誠、慎、慈、儉、謙、和」。一方面，這是具體針對宮廷生活和服務的宦官而做的調整，如「孝、弟」之教便不適用於宦官。另一方面，這也是張氏對宮內宦官所具品行的特別籲求和模塑，如「事君以忠」、「守己以廉」、「以誠行事」等品質，對宦官來講尤為吃緊。張元忬沒有刻意將宦官視作特殊群體，稱之為「人臣」，¹¹⁴認為宦官是「朝廷臣子」，¹¹⁵肯定他們能做「忠良之臣」，¹¹⁶鼓勵他們「與國家出力，濟得大事，做得好人」。¹¹⁷總之，張元忬在內書堂施展富有王學特色的道德教育，彰顯王學的政治取向和對經世事功的追求。

綜上所述，中晚明翰林教習儒臣重視且努力推行內書堂道德教化。亢思謙、陶大臨、黃洪憲、敖文禎等以善惡宦官史例施教內書堂。郭朴、汪鏜、姚弘謨、李貴、金達、黃鳳翔等則以古今賢善宦官事蹟感召宦官。張元忬不僅注重宦官史例的感召，還擬出宦官最應具備的八種品行，反復訓講，並作相應詩歌，令之誦唱，循

¹¹⁰ 張元忬：《不二齋文選》，卷六〈內館訓言〉，頁二四上至二四下。

¹¹¹ 同上注，卷一，朱賡〈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張公行狀〉，頁四上。

¹¹²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二〈語錄二·傳習錄中·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頁87。

¹¹³ 王陽明重視歌詩音樂教育，參錢明：〈王陽明的音樂戲曲思想與實踐〉，《孔子研究》2006年第1期，頁64–71；陸永勝、劉小偉：〈王陽明的藝術美論〉，《貴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頁20–28。

¹¹⁴ 張元忬：《不二齋文選》，卷六〈內館訓言·廉訓〉，頁二六上。

¹¹⁵ 同上注，〈內館訓言·忠訓〉，頁二四下。

¹¹⁶ 同上注，頁二五上。

¹¹⁷ 同上注，〈內館訓言·誠訓〉，頁二七下。

循善誘。形式多樣的道德教育內容無疑彰顯內書堂「化宦」行動向縱深發展，而以上諸人所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群體性」特徵，¹¹⁸又為中晚明士人的內書堂「化宦」實踐提供橫向觀察視角。

官定與挑戰：內書堂「化宦」讀本疊見

嘉靖、隆慶之際，李貴和黃鳳翔等已著手編纂以賢善宦官史例為內容的內書堂讀本。萬曆中讀本編纂更引起禮部高層重視，並最終導致官定讀本的確立，但這也促成翰林教習儒臣自編內容更為貼近內書堂教育實際的讀本，相與抗衡。

讀本呼聲：沈鯉〈典禮疏〉

萬曆十四年(1586)，禮部尚書沈鯉(1531–1615)〈典禮疏〉中「預教皇子之禮」，針對時齡五歲皇長子的教育問題而發。這與同年二月廷臣紛紛要求冊立太子而不能成功的背景有關。沈鯉對國本爭之甚烈，「率僚屬請冊建皇長子，進封其母，不許。未幾，復以為言，且請有建儲貶官姜應麟等。忤旨譙讓」。¹¹⁹神宗表態「少俟二三年舉行」，¹²⁰朝野大失所望。〈典禮疏〉「預教皇子之禮」，可視作爭立國本失敗的補救方案：

〔皇子〕雖聰明之盡，亦必有左右侍從為之開導牖引，……使其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前後左右皆正人，誰與為不正者？則雖未離襁褓、出講閣，而聖人之體段已具矣。……嘗稽我孝宗皇帝之在儲也，……有東宮內官覃吉者，儒雅端方，通書史，知大體，竭誠輔導，凡東宮一言一動，必引之正。……以是孝宗自在東宮時，聖德已聞於天下。及其即位，能開弘治十八年之太平，巍然為一代令主，是其效也。其後武宗以幼冲嗣位，所與游者，非馬永成、谷大用，則劉瑾、魏彬之輩也。其所馳逐者，非擊毬走馬，則俳優

¹¹⁸ 李春芳、胡杰、亢思謙、汪鏜均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姚弘謨和李貴均是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金達與陶大臨都是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黃洪憲與張元忭同為隆慶五年進士。此外，徐階與以上多人關係密切。李春芳對徐階崇拜備至，私密頗深。胡杰、汪鏜和亢思謙是徐階教席常館弟子。李貴早年受江西提學徐階賞識，入仕後又參與徐階在京組織的王門講會。陶大臨也頗受徐階器重，「數引與議國事」(王世貞：《弇州史料後集》，卷四〈陶文僖公傳〉，頁十八下)。至於黃鳳翔、趙志臯、羅萬化三人更是徐階門下士：徐階為隆慶二年殿試讀卷官。李清馥稱黃鳳翔「身出其〔徐〕門，一事之以道」。黃、趙、羅三人被命內書堂教習，更直接出於徐階安排：「故事，內堂教書用資深詞臣，元相徐文貞公不欲其壘大璫，通關節為玷，乃以屬新第三人。」見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七三〈文簡黃儀庭先生鳳翔〉，頁五下；李光縉：《景壁集》(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明崇禎十年〔1637〕刻本，1996年)，卷十二〈大宗伯儀庭黃先生傳〉，頁1889–90。

¹¹⁹ 《明史》，卷二一七〈沈鯉傳〉，頁5733。

¹²⁰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六七〈爭國本〉，頁25。

雜劇之戲也。狎褻禮體，蒙蔽主聰，未幾流毒搢紳，幾危社稷。此內廷侍臣賢否得失之明驗也，可以為鑒矣。今之內廷，豈無儒雅端方如覃吉者乎？豈無通書史、知大體如覃吉者乎？豈無愛主愛國、盡忠盡言如覃吉者乎？……特命儒臣撰集古今中官善惡事跡為一傳，付與翰林官教習，使之各知忠主上、愛身家、保富貴之道。……如是而覃吉之賢不多見者，未之有也。¹²¹

沈鯉傳達的主意有若干遞進的層面。首先，與其紛紛以冊立太子相爭而無果，不若提早考慮太子教育；太子出閣講學雖遙遙無期，但可簡選賢良內臣「為之開導牖引」。其次，想多得賢良內臣如覃吉輩輔導聖躬，¹²²則內書堂「化宦」最為重要；故命翰林史臣編寫以歷來善惡宦官史事為內容的書籍，以作施教之用，保障「化宦」之效，是為緊迫。

沈鯉提出編纂讀本以更好地「化宦」，與他隆慶初任內書堂教習的經歷應有關係。¹²³但沈鯉的建言，《明神宗實錄》和《萬曆起居注》均未載錄。結合萬曆中君臣因國本之爭對立的情形推知，神宗可能對其未作回應。然而，萬曆十四年沈鯉提議後六年內，王畿的《中鑒錄》和張世則（萬曆二年進士）的《貂璫史鑑》先後進入內書堂，成為內書堂官定讀本。

讀本官定：《中鑒錄》與《貂璫史鑑》

《中鑒錄》和《貂璫史鑑》（下文簡稱《史鑑》）兩書定為內書堂讀本，不遲於萬曆二十年。當年六月，張世則奏呈《史鑑》一部。七月，禮部覆疏稱：「伏乞……印發內書堂，人給一帙，俾與《忠鑑錄》俱定為課程，日夜誦讀，庶幾口誦而心惟，或可遷善而改過，內侍將有得人之慶矣。」¹²⁴檢古來相關書目，並無《忠鑑錄》一書記載，疑為別書。結合萬曆間周如砥稱「內館〔內書館〕故有《中鑒錄》一書，邇又有《貂璫史鑑》一書」，¹²⁵可知上文所謂《忠鑑錄》，實為《中鑒錄》之誤。

《中鑒錄》進入內書堂，沒有證據表明是不喜王門講學的沈鯉所為，萬曆十六年（1588）繼沈鯉之任的朱賡可能性倒非常大。萬曆初年志在推廣《中鑒錄》的王畿致信

¹²¹ 沈鯉：《亦玉堂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典禮疏〉，頁二八上至三十下。

¹²² 皇帝年幼或太子不能出閣講學，明代士人便期望賢宦出現。這最早見於弘治間馬文升〈題為豫教皇儲以隆國本事疏〉，見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六二，頁505。正德後，這一訴求更為強烈，但其理想宦官不再是馬氏疏中之覃吉，變為沈鯉疏中所說之覃吉。

¹²³ 《明史》，卷二一七〈沈鯉傳〉，頁5733。

¹²⁴ 張世則：《貂璫史鑑》，《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卷首〈禮部題為感恩傾藹述事效忠恭進所纂貂璫史鑑上塵御覽以清內治以杜邪萌事〉，頁二上。禮部的覆疏在《實錄》中有所節略，見《明神宗實錄》，卷二百五十，萬曆二十年七月癸酉條，頁4659。

¹²⁵ 周如砥：《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卷二〈刻中學始肄序〉，頁三上。

朱賡，要求其襄助陽明從祀之議，¹²⁶可見關係之密。朱賡不僅與從學於王畿的趙志臯、羅萬化為同年好友，而且與王畿弟子張元忭是同窗密友，張元忭更在王畿《中鑒錄》的影響下施教內書堂。綜合這些因素來看，朱賡可能熟悉《中鑒錄》，進而將該書薦入內書堂。但《中鑒錄》的成功，更可能是自沈鯉以來禮部高層共見的結果。萬曆十七年(1589)，朱賡丁憂，于慎行(1545–1608)接任禮部尚書。于慎行與趙志臯、朱賡同年，他與沈鯉的提議不謀而合，也曾考慮撰寫一部以宦官為題材的內書堂教育讀本，「惜有志未逮焉」。¹²⁷

雖然《中鑒錄》「官定」的情形撲朔迷離，但張世則《史鑑》確曾得到禮部的大力支持。張世則，字準齋，山東諸城人，官至江西左布政使。刊行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左右的《史鑑》，共四卷，分六篇：主君、弼臣篇分列歷代君、臣駕馭宦官得失的事例；妍範、媿戒兩篇各載古今宦官「善可為法」和「惡可為戒」者；國祚篇專錄秦漢以來宦官「尤能亂國」之「奸璫鉅惡」，沿革篇則述秦漢唐宋及明太祖時宦官職官的沿革。

張世則撰《史鑑》，直接用意是對明神宗寵任東廠太監張鯨的「諫諍」，¹²⁸但此書「欲化宦寺」的目的也甚為明顯。張氏在進書疏中稱「此書之旨，堪為此輩〔宦官〕之寶鑒也」，並一再重申該書對內書堂教育「似不可無也」。¹²⁹即便如此，從張世則進書疏整體來看，仍偏重警戒神宗防止宦官亂政。相較而言，禮部的覆疏頗具策略性，將張氏奏疏的重點加以巧妙回轉：對此書可備神宗辨別宦官賢奸只作點到即止的交代，凸出此書對內書堂「化宦」的意義，謂《史鑑》「所稱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實與《忠鑒錄》相發明。……蓋將聳動心志于片言，而轉移禍福于一念，誠內史淑身之寶鑑」。¹³⁰禮部的策略看來頗為湊效，神宗竟「嘉納之」。¹³¹總之，在禮部的巧妙周旋下，《史鑑》得以和《中鑒錄》一起，成為內書堂小宦官「日夜誦讀」的官定讀本。

官定的挑戰：周如砥《中學始肄》

《中鑒錄》和《史鑑》成為內書堂的官定讀本，理論上，這意味著晚明內書堂「化宦」行動進入有本可依的階段。¹³²但對此翰林教習儒臣不一定認可，甚至根據內書堂

¹²⁶ 《王畿集》，卷十一〈與朱金庭〉，頁288。

¹²⁷ 張世則：《貂璫史鑑》，卷首，于慎行〈貂璫史鑑序〉，頁一下。

¹²⁸ 吳兆豐：《「有教無類」：中晚明士大夫對宦官態度的轉變及其行動的意義》，頁259–76。

¹²⁹ 張世則：《貂璫史鑑》，卷首〈整飭安綿兵備四川按察司僉事臣張世則謹奏為感恩傾藹述事效忠恭進所纂貂璫史鑑上塵御覽以清內治以杜邪萌事〉，頁二下、三下、四上。

¹³⁰ 同上注，〈禮部題為感恩傾藹述事效忠恭進所纂貂璫史鑑上塵御覽以清內治以杜邪萌事〉，頁一下至二上。

¹³¹ 《明神宗實錄》，卷二百五十，萬曆二十年七月癸酉條，頁4659。

¹³² 《中鑒錄》與《貂璫史鑑》雖成為內書堂官課，但兩書在多大程度上切實地影響晚明內書堂「化宦」行動，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化宦」的實際，起而反對，重新編纂讀本。同為萬曆十七年進士、相得甚深的焦竑（1541–1620）、周如砥二人即有志於此。

焦竑師事泰州學派耿定向（1524–1596），¹³³著述豐富，「其精神所注，在大道與經世」。¹³⁴《明名臣言行錄》、《本朝分省人物考》、《明史》等史書都將焦竑「授書」內書堂時間繫於萬曆二十二年後，¹³⁵殊誤。焦竑自稱改任起居注官前一年擔任內書堂教習。¹³⁶考萬曆十九年（1591）庶常館散館後，焦竑授翰林修撰，翌年任會試考官，同年四月奉使南行，至二十一年（1593）夏回京，¹³⁷同年六月改任起居注官。¹³⁸可見，他應在萬曆十九年至次年四月間教習內書堂。

焦竑在內書堂不僅「取古奄人善惡，時與論說」，¹³⁹還著手編寫「古宦者行事」專書，供其閱讀。萬曆二十一年，焦竑致信張世則云：「昨歲以職事課讀禁中，念主上高拱深嚴之中，所奔走給事者，獨宦豎輩耳。倘少能啟發，令知所嚮往，即涓埃之念，可藉手自效。因取古宦者行事，日指示之，亦頗有樂聽者。……僕已改直起居注，前事未竟，託敝寮終之。得來刻，即可就此敷衍，不必更搜討矣。」¹⁴⁰焦竑以內書堂「化宦」作為間接落實「格君」的步驟，昭然可見。焦竑有意編纂讀本卻未成稿，實因他有新任，故轉託同道周如砥完成。

周如砥官至國子監祭酒，「留心理學而避講學之名」。¹⁴¹吳道南（1547–1620）為周氏作墓銘，云：「先是，教習內書堂，人多故事視之。公謂：『左右贊御，不可不慎其端。』以語焦弱侯，弱侯然之。乃取歷代宦官行誼之可法者，繪圖錄以成帙，曰《中學始肄》。上覽其書，大稱賞。」¹⁴²周氏自敘與墓銘略有不同，稱編纂《中學始肄》導源於焦竑：「弱侯焦公典內館時，常欲別為一書，務使之易解而樂聞，其為慮甚遠，會有它命，不果。而予適從公後，嗣典其事，則因而輯成之，名曰《中學始肄》。」¹⁴³從引文可見，不同於《中鑾錄》等書，「繪圖錄以成帙」的《中學始肄》圖文並茂。這既為增加內容的可讀性和趣味性，吸引宦官閱讀，叫他們潛移默化，又與萬

¹³³ 黃宗義：《明儒學案》，卷三五〈文端焦澹園先生竑〉，頁829。

¹³⁴ 焦竑（撰）、李劍雄（點校）：《澹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附編二，陳懿典〈尊師澹園先生集序〉，頁1214。

¹³⁵ 同上注，附編三，頁1227、1229、1230。

¹³⁶ 同上注，卷十三〈答張準齋〉，頁105。

¹³⁷ 同上注，附錄四〈焦竑年譜〉（簡編），頁1293–95。

¹³⁸ 《明神宗實錄》，卷二六一，萬曆二十一年六月壬寅條，頁4845。

¹³⁹ 焦竑：《澹園集》，附編三，《明史·焦竑傳》，頁1230。

¹⁴⁰ 同上注，卷十三〈答張準齋〉，頁105。

¹⁴¹ 吳道南：《吳文恪公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吳之京刻本，卷十七〈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礪齋周公墓誌銘〉，頁十八下至十九上。

¹⁴² 同上注，頁十八下。

¹⁴³ 周如砥：《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卷二〈刻中學始肄序〉，頁三下。

曆間宮內各類教化書籍均配有插圖的潮流吻合。¹⁴⁴更重要的是，得神宗「大稱賞」的《中學始肄》，可能與《中鑒錄》等書一樣，成為日後內書堂必讀之書。

然而，《中學始肄》今不存，只能從周氏所作序跋知其概貌。是書「事凡三十，為目八」，收錄歷代「善可為法」宦官史事，「大都有勸無懲，乃懲在其中矣」。從內容看，它與《思齊錄》相似，都分為八類。但周氏沒有提及《思齊錄》，卻對《中鑒錄》和《史鑑》提出批評，指出兩書可謂「中人之碎盤」，但「迹其所論述，予者什一，奪者什九，詎不凜凜可以待呂〔強〕、張〔承業〕之屬自為觀省，未可以為始教也」。換言之，兩書褒少貶多、法戒森嚴，只可作賢宦自勵之用，難成宦官遷善去惡之具，更不可備宦官初學始教之資：「凡人情之于始學，譬小兒之于藥然，甘則茹，苦則噤，強而投之則噁。故醜人之類以為訓，動加誚讓，而以幾遜志，是惟賢者則可，自非然者，百言而百不入之道也，而況中人乎？……昔秦越人之為小兒藥也，炙之泡之，苦者甘之，持以飲兒，其嗜如飴，比覺其苦，而所入已深，故能有瘳效。」¹⁴⁵周氏借嬰兒飲藥的設喻，指出內書堂初學之教，應令其喜聞樂見方為有用，其《中學始肄》正是令內書堂宦官樂於展玩的「甘茹」良藥。周氏批評《中鑒錄》和《史鑑》鄙棄宦官，執於一偏，乃至「醜人之類以為訓，動加誚讓」，與內書堂「化宦」實際不相照應。平情而論，《中鑒錄》和《史鑑》本非專為內書堂而設，作者也都沒有內書堂任教的經歷，不能完全符合「化宦」實踐可以料想。然而，強調拋棄偏見、著眼於令宦官樂意接受，確是周氏自矜之處。¹⁴⁶

總之，《中學始肄》雖以不滿官定課程的面貌出現，然其呈現的不同特色，反映中晚明士人不斷探索怎樣更好地施展內書堂「化宦」之效。直至天啟間，士人仍一再編寫讀本。天啟三年（1623），乞歸在家的東林人士錢士升（1574–1652），致信內書堂教習侯恪（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¹⁴⁷希望他重視教事：「祖宗立法，欲使若輩識詩書，知義理，而董之以詞臣，所謂『宮中府中，相為一體』也。竊以為古來宦豎可為法戒者，宜彙為一書，令小璫童而習之。獷豕之牙，尤易為力」。¹⁴⁸錢士升以

¹⁴⁴ 張居正等所編《帝鑑圖說》、呂坤《閩範圖說》、焦竑所纂《養正圖解》，無一例外。參 Julia K. Murray, "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 in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ed. David M. Robin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pp. 231–68。

¹⁴⁵ 周如砥：《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卷二〈刻中學始肄序〉，頁三上至四上。

¹⁴⁶ 在周氏看來，美醜善惡皆是士人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所致，宦官未必能接受；《中學始肄》則不然，是使宦官樂覽而致思、熟思、反省的有用書籍。見周如砥：《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卷四〈中學始肄跋〉，頁三三下至三四上。

¹⁴⁷ 《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1968），卷三六，天啟三年七月壬寅條，頁1856。

¹⁴⁸ 錢士升：《賜餘堂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1739）錢佳刻本，卷六〈與侯木庵〉，頁二上。

《易·大畜》「豶豕之牙」經訓證示，與其極力排抑宦官卻效果不佳，不如令宦官從小接受訓化而容易着力。一言以蔽之，重視內書堂作為「化宦」場合，強化並推行以古今宦官史例為主的道德教育，編寫讀本以供內書堂施教與宦官自修之用，漸成中晚明士人的共同關注和持續行動。

結 論

本文主要論析中晚明士大夫圍繞內書堂，形成教化宦官的認識與行動，展現十六世紀士人重要而曲折的「得君行道」途徑，即透過內書堂的「化宦」，間接落實「格君」的理想，改善政治。

與明前期士人對內書堂觀感欠佳不同，中晚明人士無論在朝在野、思想流派或政治主張殊異，都重視內書堂，視其為「化宦」進而間接裨益君德的平臺。這一情形與明中期以後君主罕接臣僚、長期不理朝政，宦官在政治制度與權力結構之中處於關鍵性位置，士人直接「格君」希望趨於渺茫，密不可分。換言之，政治形勢有變，使士人「得君行道」的經世理想，不得不由直接「格君」向「化宦」以間接「格君」方向轉折。當「格君」理想曲折地轉化為教化常在君主身邊的宦官，內書堂遂變得重要，成為士人心中教化宦官的重要機制。

中晚明朝野形成的內書堂「化宦」認識，更變作翰林教習儒臣的教化實踐。亢思謙等人兼舉善惡宦官史例以作勸戒；郭朴等人相信「見賢思齊」之訓，專門講說古今賢良宦官事蹟，期使宦官受到感召鼓舞；張元忭不僅以賢善宦官史例感召宦官，而且秉承祖師王陽明〈訓蒙大意〉之教，專門針對宦官特性，以「忠、廉、誠、慎、慈、儉、謙、和」八種品行訓示宦官，並將其編成易懂上口的詩句，讓內臣歌詩詠唱。雖然「化宦」內容與方式呈現異彩紛呈的局面，但增添和加強道德教化與感召，注重以古今宦官史例反復訓化內書堂宦官，是其共同特色。

編纂適合內書堂宦官閱讀、效果好的讀本，是中晚明「化宦」行動的重要一環。內書堂「化宦」的認識與行動，促使以宦官史例為內容的內書堂讀本出現。嘉靖末李貴《思齊錄》即為最早嘗試。萬曆中禮部高層沈鯉更倡議編纂內書堂讀本，以更好地「化宦」。萬曆二十年，在禮部支持下，張世則《史鑑》同王畿《中鑒錄》更一起成為內書堂官定課程。即便如此，富有施教經驗的周如砥等人卻有不滿，他們另起爐灶，以「歷代宦官行誼之可法者」為內容，編成圖文並茂的《中學始肄》，希望它成為宦官喜玩樂誦、甘之不捨的有用讀本。

中晚明士人本著儒家「萬物一體之仁」宗旨的精神，藉由內書堂展開教化宦官的運動，既可見其上層經世熱情不減，又從一個側面揭示明代中後期士人與宦官在政治文化上的良性互動關係。中晚明宦官的知識文化有所提高，他們對國家擔當的意識也有提升。這一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現象，與士人「化宦」認識及行動相得益彰，或多或少交互證示士人與宦官在政治文化上愈趨一體。

與中晚明士人由內書堂「化宦」而「格君」的努力同樣重要的是，受教化的宦官怎樣表現、如何去影響君主？萬曆末司禮太監金忠撰帝學用書《御世仁風》之例，尤其象徵意義。金忠，萬曆六年選入宮，讀書內書堂。¹⁴⁹所著《御世仁風》一書，「仿佛如《帝鑑圖說》，圖文並茂，纂鈔古今經史百家之書，分類舉呈君道、治道之具，是「恒以輔養君德為念」的金忠諫言「格君」的表現。¹⁵⁰雖然中晚明士人內書堂「化宦」努力沒能阻擋萬曆中期以來黨爭延伸——天啟間以大璫魏忠賢為首的閹黨與東林鬥爭，¹⁵¹但對於金忠撰作《御世仁風》來「格君」，及中晚明受教化的宦官如何表現，仍是關係到「化宦」成效與中晚明政治文化異動的重要議題，值得進一步研討。

附錄：張元忭〈內館訓言〉

萬曆戊寅秋，余奉命教習內館。蓋諸豎雖微眇，然必教之於童時，使知趨向，而後用之於他日，庶無愆違，此聖祖深意也。第往時率以尊官領之，而今則薄視其職，類用資淺者，又以五人輪番而入，分既不隆，任又不一，安望其有裨哉？余以為任無大小，莫非王事，矧茲教習，所關係非淺鮮者。故每如期而入，於常課之外，擬為訓言八條，曰忠、廉、誠、慎、慈、儉、謙、和，各系以詩；又摘史傳中賢宦事蹟，各為訓解，日取一條，令年長二人宣讀二遍。諸童豎皆環立而聽，講畢歌詩，皆同聲而和之。維時司禮老成者，聞館中講且歌，並相讚歎，諸豎亦勃勃鼓動。儻行之二三年，未必無補萬一。惜余在館兩月，尋有管理誥勅之命，遂不復入。所著訓言，僅僅數條耳。今錄於此，以告同心者。

忠訓（講者講此）

凡為朝廷臣子，無論官之大小，地之內外，皆當以盡心報國為心。古人一飯不敢忘君，何況爾等自幼蒙恩，選入掖庭，一飲一衣，皆是朝廷所賜。又特命翰林官教習作養，蓋欲爾等曉古今，識理義，他日可稱任使，免於過愆。爾等受此天高地厚罔極之恩，可不焚香自誓，做箇忠良之臣？且說如何為忠，只是一心為着朝廷，不為一己私圖而已。爾等今日聚於一堂，先須各存此心，他日一有官守，即當各盡其職。或蒙主上簡拔，衣蟒腰玉，益宜殫竭忠貞，小心敬畏，不可怙寵自恣；或時命

¹⁴⁹ 金忠傳記見劉若愚：《酌中志》（《續修四庫全書》本），卷二二〈見聞瑣事雜記〉，頁七下。

¹⁵⁰ 金忠：《御世仁風》，明末刻本（香港大學藏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北平圖書館善本書膠片），卷首，周詩〈御世仁風序〉，頁五下；卷首，劉鐸〈御世仁風序〉，頁一上至九下。

¹⁵¹ 相關研究參 Ulrich Hans-Richard Mammitzsch, “Wei Chung-hsien (1568–1628): A Reappraisal of the Eunuch and the Factional Strife at the Late Ming Court” (Ph.D. diss., University of Hawaii, 1968); John W. Dardess,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The Donglin Faction and Its Repression, 1620–1627*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不齊，官職卑小，亦宜隨緣守分，思報主恩，不可少有怨望；或在主上左右，務要保佑聖躬，勸以親賢勤政，不可導以非義；或蒙差遣出外，務要簡約安靜，體恤小民，布宣朝廷德意，不可橫作威福。凡此皆是盡忠之事，爾等果能若此，則富貴可保於生前，名譽且垂于身後，豈不美哉？豈不榮哉！

訓忠吟（講畢歌此）

聖主恩波海樣深，無分中外重詞林。欲將涓滴酬滄海，但願諸君矢赤心。
一飯之恩不可忘，君恩況乃比穹蒼。請看自古忠良輩，青史標題姓字香。

廉訓

人臣欲事君以忠，必先守己以廉。其或敗名喪節，未有不由於貪者。官無大小，朝廷皆有俸給，以養其廉，苟務省約，日用自充，此外妄求濫取，皆為不義。非鼠竊於公家，則漁侵於私室。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忠良之臣，必不如此。且人之貪得無厭者，將為目前計乎？則高堂大廈，夜臥不過一床；五鼎八珍，日食不過一飽。一身之外，悉為剩物。徒自營營，於我何益？將為身後計乎？則貴賤同歸于黃土，貲財頓屬於他人。一身之外，盡將不去，向來碌碌，祇成一笑。以此兩端，日夜細思，則廉靖為樂，貪黷為憂，不待智者，當自瞭然。古昔中貴如東漢丁肅等，以清謹稱。後魏趙海領節鎮，人或以賂干之。海曰：「高官厚祿，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受。皇太后聞之，獎賜甚隆。此等賢璫，享福于當時，流芳于百世，乃是爾曹的師範。其當勉哉！勉哉！

訓廉吟

清白由來世所欽，莫將阿堵壞良心。古人見利能思義，留得芳名直到今。

誠訓

人生世間，處心行事，全以誠為主。古聖賢立下掀天揭地的功業也，都從誠上起。若還不誠，則根本先壞。縱然用計用數，畢竟做不得好人，濟不得大事。且說如何是誠，只真實不欺而已。即爾等蒙恩作養，選入讀書，若真要自己進益，着實用功；真要朋友大家進益，着實勸勉。後來受了官職之時，或管理事務，用心幹辦；或給事御前，加意保護。纔於道理上不安，斷不妄想；於法度上有礙，誓不胡行，這便是不欺而誠。若徒具目前，苟且塞責，專事機械，背公營私，以小惡之無妨，謂非道之可妄，這便是欺而不誠。所以《大學》釋「誠意」，只說「毋自欺」；而孔聖人論「事君」，亦只說「勿欺」。夫臣而欺君，莫大之罪，在人豈肯蹈之者？始初只緣一念不誠，以漸彌縫掩覆，便至不可收拾耳。今爾等正宜存誠不欺，立定根本，乘此

時會，輔以才能，他日必然與國家出力，濟得大事，做得好人，亦不虛此一生矣。其相與勸之哉！

訓誡吟

愛國忠君仗至誠，休將一念壞平生。勿欺請繹宣尼訓，留取丹心答聖明。

東漢李巡

汝陽李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汝陽即今汝寧府屬縣。漢時置有五經博士，甲乙科是明經、射策科，署為小大兩等，有甲乙科之辨。蘭臺即秘書省，所藏孔壁汲冢科斗文，皆漆書。東漢史上說，李巡因做博士來試甲乙科的，專一爭論等第高下，互相言說，各要求勝，甚至有了賄賂，反定過蘭臺漆書經字，去合着那人的私文者。國家試科，最是公典，於此尚然，納賄何所不至。只因當時五經不定，所以賄賂得行。李巡乃奏聞靈帝，使與諸儒刊刻經文於石。於是詔議郎蔡邕等訂正經文字樣，用三體書之，立於太學門外，今相傳石經便是。自後五經定而文教明，爭端息而士風正矣。此皆李巡建議之功也。其行事如此，又安肯自開賄賂之門，以塞眾正之路哉？史稱清忠，有以也夫！

東漢曹騰

曹騰，沛國譙人也，用事省闈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所進達皆海內名人。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于騰。益州刺史种暠，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騰不為纖介，嘗稱暠為能吏。時人嗟美之。

沛國即今鳳陽府地方。譙是譙縣，今之亳州是也。用事省闈，是指他在內裏管事。東漢史上說，曹騰是沛國所屬譙縣人，在內裏管事三十餘年，奉事漢家四朝皇帝，這等年久，始終未有過失，在帝前惟知薦賢為國。所進達的人，都是四海之內有名望的，不肯引用那人，壞了國事。蜀郡即今四川地方。計吏就與今之朝覲官一般。益州是四川所屬的州名。太守、刺史都是官名。种暠是益州刺史的姓名。賂遺是私送禮物。那時有箇蜀郡的太守因考滿官來京，寄些禮物，私送與騰。益州刺史种暠搜得那太守送禮的私書，便上奏疏劾他不該私送也，曾劾着騰不該私交外官。似常人記讎的，日後豈不忌恨种暠，騰卻無纖毫介意，時常只稱說种暠是箇有才能的好官。當時人見騰這等至公，都嗟嘆稱美，以騰為難及。大凡人臣在君上前論人賢否，都該付之公道。自己的私恩私讎，都不可存在心間，纔是忠臣。觀曹騰只此一事也，記在史書，留名百代，況能秉公持正過于曹騰者乎！

東漢呂強

呂強，河南成臯人也，自小黃門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以例封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書奏，帝知其忠。

河南成臯，即今開封府所屬汜水縣。小黃門、中常侍，都是內裏的官銜。東漢史上說，呂強是河南成臯人，從小黃門陞中常侍之職，金璫右貂，官已尊了。他平日為人清謹忠亮，奉公守法，是箇忠臣。漢靈帝時嘗封中常侍曹節等為列侯，已有這箇例，故要把強也封做都鄉侯。呂強自思漢高帝定下盟約，原說非功臣不侯，我等雖在御前給事，豈是汗馬功勞，可當侯爵？再三辭讓，詞義懇惻，固執不敢當。靈帝方纔聽允，不封他了。強因上疏陳說此事，大約謂封侯之例，斷不宜開，須得從此停止。其言激切詳盡。書奏入，靈帝省覽，也知他純心為國，是箇忠臣，但不能用之耳。使當時能進用呂強，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今遇聖明在上，簡任忠良，果有呂強其人，何患不行其志哉？

後魏趙默

趙默，河內溫人也，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關內侯。出為定州刺史，克己清儉，憂濟公私。時或有人欲行私賂，默曰：「官高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納。帝聞之，賜帛五百匹，穀一千石。

溫縣屬懷慶府，定州屬真定府。刺史，就是太守官。《魏書》上說，趙默是溫縣人，有容貌，小心謹慎，朝廷信任他，賜爵位至關內侯上。後來陞出監定州刺史，在官克己清儉，不為身圖，惟苦心幹辦，一切政務，憂濟公私，又肯任事，是箇好刺史。那時有人要行賄賂，干他以私。趙默說道：「凡人壞了操守，或者為貧所累，或原是好利的人；我官高祿厚，自足贍給，況賣公法，營己私，本非情願，安用賄？」竟却而不納。孝文帝聞知，道有這等清操，須是賞賚優獎，因賜他帛五百匹，穀一千石。古人說「非澹泊無以明志」，又說「人生最難克是利欲」。故要做好人，全在操守上。要勵操守，全在儉約上。若專務靡麗奢華，必得錢神用事，用之無節，不免取之無道，賄賂所以公行也。史稱趙默卻賄，而言其克己清儉。然則儉之為務，其亦克己之一端與？

東漢良賀

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

大長秋是內裏尊官，陽嘉是漢順帝年號。東漢史上說，良賀為人清謹儉約，謙退敦厚，歷官至大長秋位。陽嘉年間，曾下詔書，令九卿舉武猛可任將帥的人，賀

獨無所薦拔。順帝怪，問其故。賀對說：「臣生田野草茅之中，長而給事宮掖之內，既無知人明哲，又未嘗與士類私交，何從薦之？且於事理亦有不可。昔衛國商鞅，因嬖人景監以見秦王，那時有識之士，已知他不能善終，後竟有車裂之禍。今得臣之舉者，萬一如鞅，無榮無辱，此臣所以不敢也。」因固辭之。看來良賀惟恐引用匪人，以致敗事。此正其忠於朝廷處，故卒而帝思焉。

中晚明士大夫教化宦官「運動」：以內書堂為中心

(提要)

吳兆豐

本文旨在探討中晚明士大夫圍繞內書堂—明代內廷宦官讀書之所，形成教化宦官的認識與行動，展現其重要而曲折的「得君行道」途徑：即透過內書堂「化宦」間接影響君主，落實「格君」理想。相比於明前期士人對內書堂觀感欠佳，中晚明人士無論在朝在野、思想流派或政治主張殊異，均視內書堂為「化宦」進而裨益君德的重要平臺。「常課」之外，增加道德教化內容，以古今善惡宦官史例，反復訓化令其向善，更成為內書堂教習儒臣之共趨。其中尤具特色的是王陽明再傳弟子張元忭，他不僅重視以宦官史事為主的道德感化，而且針對宦官身份的特點，以「忠、廉、誠、慎、慈、儉、謙、和」八種品行相教，並將其編寫成易懂上口詩句，讓內臣歌詠。與內書堂教習儒臣「化宦」行動相伴而來的，是以宦官史例為內容的內書堂道德教育讀本的編寫、官定及挑戰情形，反映中晚明士大夫內書堂「化宦」的深入展開與成果表現。這場可稱之為內書堂教化宦官的運動，既揭櫫一條以「化宦」來「格君」的切實路徑，可見中晚明士人「得君行道」的熱情不減，又從一個側面展現明代中後期士人與宦官在政治文化上的良性互動關係。

關鍵詞： 明代 士大夫 宦官 內書堂 教化 得君行道

The “Movement” to Promote the Eunuch’s Moral Improvement in the System of *Neishu tang* by the Mid-Late Ming Scholar-Officials

(Abstract)

Wu Zhaofeng

This paper studies how the mid-late Ming scholar-officials enlightened eunuchs to be morally upright people in the system of *Neishu tang* (the eunuch school in the palace) in the hope that these eunuchs would subsequently influence the emperor’s moral characters; with that, the scholar-officials could influence indirectly the moral character of the emperor. The paper first reveals how scholar-officials changed from directly rectifying the emperor to enlightening the eunuchs and how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Neishu tang* changed from despising eunuchs to recognizing eunuchs as a political entity whom, with proper moral education, could assist the emperor. Through examining the textual materials written by the teachers of *Neishu tang*, top-ran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local elites, and eunuchs of inner courts,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at many scholar-officials, despite their political faction, academic ideology, class, status, or official position, had come to agreement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educate eunuchs of the inner court in the system of *Neishu tang*. The lessons prepared for the eunuchs at the *Neishu tang* also changed from the simple writing of poetry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t cases (both good and bad examples) of eunuchs in history.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is that of Zhang Yuanbian, Wang Yangming’s second-generation disciple, who not only impressed upon eunuchs the good deeds by eunuchs in history, but also composed Chinese verses based on the eight moral characters (loyalty, honesty, sincerity, prudence, kindness, frugality, modesty, and harmony) for eunuchs to sing. Finally,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challenging issues faced by scholar-officials when establishing the course curriculum and selecting cases for the textbooks in *Neishu tang*. It concludes that scholar-officials in the mid-late Ming dynasty, who upheld the principle of “benevolence of all things,” believed that eunuchs could be loyal and benevolent with proper training and moral education. These scholar-officials attempted to rectify politics and counsel their emperor by enlightening the eunuchs through the system of *Neishu tang*. Their interests in influencing the emperor as well as politics with their ideals and values remained strong.

Keywords: Ming dynasty scholar-officials eunuchs *Neishu tang* (the eunuch school in the palace) moral education influencing the monarch with ideals and values

